

《恒顺故事》选登

李友芳扶危正途

□ 滕建锋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反动政府消极抗日，日寇则趁机步步紧逼，疯狂侵占中国领土。同年12月，镇江沦陷，日寇在镇江大肆屠杀群众并掠夺镇江人民的财产、焚烧民房、强奸妇女，残忍罪行罄竹难书。众多市民纷纷外逃避难，本来准备增资扩股的李泉宇也赶紧携全家避往重庆，后绕道回到上海。

1938年1月，出门避难的镇江市民陆续回城，恒顺工人为维持生计，一面日夜护厂，一面准备恢复生产。而躲避在苏北的李泉宇异母兄弟、并非恒顺股东的李武来到镇江，看到恒顺完好，又没有资方负责人，就以李氏代表自居，自封为恒顺经理，窃取了企业大权。

李武一向不务正业，是个有名的混混，曾做过伪巡官，为非作歹，诈骗他人钱财。他把持恒顺后，以恒顺为其经济基础，勾结事敌旧相识，以钱铺路，贿赂敌伪，并与日寇鸠山搭上关系。为了取媚于日寇，李武不仅将自己的别墅作为招待日商的场所，还将西钱房让给日军做“台基”，敌伪分子、鬼子兵来往不绝。1940年，李武爬上了伪商会理事长的位置。他疯狂压榨工人，扣发工人工资，降低工人生活标准，恒顺工人先后进行了两次罢工抗争。抗日战争胜利前1个月，李武暴卒于镇江。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此时的恒顺已千疮百孔，摇摇欲坠，而在上海的李氏族人却无人敢来镇江掌管。此时，李泉宇年事已高，经过家人几度磋商，认为李友芳在李氏子侄辈中最为年长，又曾在镇江李源记做过高级职员，对镇江地方情况较为熟悉，加之其当时在上海尚无固定职位，于是公推李友芳到镇江掌管恒顺。

李友芳，1903年7月28日出生于浙江镇海。1909年随父母迁居镇江，1918年考入镇江中国银行当练习生。20岁时在其父李泉宇开设的李源记煤油号当会计，又先后任过仪征十二圩美丰洋行面粉号经理、泉州面粉厂驻镇江经营部经理、南通复兴面粉厂经理等职。

1946年1月，李友芳来到镇江恒顺就职。此时，恒顺等三家工厂被地方当局列入要封的厂，“绥清公署”派人到恒顺搬走了家具100余件。李友芳多方找人出面疏通，最终化解了恒顺被封门闭厂的危机。他又利用自己在金融界的社会影响力多方筹集资金，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帮助恒顺度过了那个灾难深重的时期。李友芳视产品质量如生命，他定下规矩：不管哪一天，只要醋的质量好、产量高，就通知厨房买肉犒赏工人师傅。这在当时的制醋师傅间被传为美谈。恒顺生产力逐渐恢复，1946年年产醋350吨，醋220吨，百花酒、仿绍兴酒40吨。

李友芳是一位爱国的民族资本家，他曾利用参议员这一公开身份，筹集资金购买了600担大米，分几次运到苏北解放区支持革命事业。在白色恐怖时期，他的长子李光耀与一批有志青年绕过敌人的层层封锁，历时一个多月，到达延安参加革命。1948年10月，李光耀在解放太原的战斗中身负重伤，以身殉国。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李友芳不仅捐出了全部资产，还支持四子李光耀报名参军。李光耀于1951年1月随部队赴朝参战，凯旋回国后被送到海军基地海测培训班学习海测技术，1956年被分配到东海舰队海测大队担任测量员。1960年12月6日，李光耀带两名战士划着橡皮艇到舟山附近的沿海进行测绘时，橡皮艇在暗礁上搁浅，为救战友，李光耀光荣牺牲，被迫认为革命烈士，记三等功。

李友芳还是我国早期的邮票收藏家，在他身后，夫人蒋侣云女士先后分两次将他珍藏的邮票共计5194枚捐献给了镇江博物馆。李友芳的邮票收藏遍及五大洲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价值连城的清光绪四年(1878)我国最早发行的大龙邮票彩色无齿样票、小龙邮票黑印样、慈禧六十寿辰的邮票样票、日本蟠龙邮票、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邮票等。

走过漫长的一个世纪，恒顺几易其主，兴衰起伏，历经沧桑，熬过磨难，终于迎来新中国诞生的曙光。

管有为烈士事迹考辨

——兼谈新发现的管有为手迹及诗作

□ 孟宪威

管有为(1900—1940)，丹阳人，革命烈士。青年时代曾任塾师，后学易经，又学算命相面之术，自号“卧月山人”。1933年始在上海城隍庙挂牌算命，名气日增，有“管半仙”之称。抗日战争爆发后，回乡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春，为搜集日伪情报，受陈毅、管文蔚派遣进入镇江城里开展活动。后因暴露被捕入狱，于1940年初壮烈牺牲。现在关于烈士事迹的介绍颇有矛盾、不确之处，今结合相关资料试作考辨。

与陈毅相识的时间

关于陈毅与管有为相识的时间，许多烈士事迹资料或文章都记述为“1938年10月，陈毅到丹北视察管文蔚部期间”。如《丹阳革命英烈传选编》(丹阳市政协教卫文史委、丹阳市史志办编)、《持相相助抗敌的“管半仙”》(镇江市史志办撰)。

查《管文蔚回忆录》，对陈毅与管有为相识过程有记载，但时间未明叙。不过在《惠浴宇回忆录》中，对陈、管相见有着一番详细、生动的记录。惠浴宇，1928年入党，1938年秋从延安来到新四军一支队工作，后任新四军挺进纵队大队指导员、三支队政治部主任，中共苏中工委书记，苏北临时特委书记，苏北特委书记，江都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中共泰县县委书记兼县长等职，是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参与者，1949年后曾任江苏省省长。

《惠浴宇回忆录》“深入虎穴分向背，统战政策显神威”一章中曾记载了陈毅来视察，管有为给陈毅算命的趣事。从文中可知，管有为当时并不认识陈毅，此次相见为两人的初见。至于时间，则是在“挺纵”到江北后。“挺纵”，即新四军挺进纵队。“挺纵”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新四军一支队挺进苏南后，派刘炎、张震东、郭猛等20余名军政干部到管文蔚部帮助工作。1938年9月，管文蔚的丹阳人民抗日游击纵队正式编入新四军，番号为新四军挺进纵队。1939年1月，“挺纵”派出一部北渡长江，控制江都仙女庙以东之大桥、嘶马、吴家桥一带，逐步向江北开拓；第二阶段：叶飞率领的江南抗日义勇军(新四军老六团)与挺进纵队合编，番号仍为新四军挺进纵队。新“挺纵”是1939年11月在扬中合编的，指挥机关在江北会合则要到1940年元旦后(《叶飞回忆录》)，因此文中所指“挺纵”到江北后”，应当是老“挺纵”在江北发展期间，也就是1939年1月—11月间。

数度随陈毅、管文蔚赴泰州辨

镇江市志(1983—2005)人物传“管有为”条目中记载：“(管有为)曾数度随陈毅、管文蔚去泰州与国民党苏鲁皖边区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等商讨合作抗日之事。”此说不确。

新四军东进期间，陈毅为开展李明扬、李长江的统战工作，曾“三进泰州”，成为党史上的一段佳话。查《陈毅年谱》，三次的时间分别是1939年8月、1939年12月上旬和1940年3月。第一次、第三次陈毅进泰州均由惠浴宇陪同，管文蔚尚且未去，管有为更不可能跟随。第二次陈毅进泰州由管文蔚、惠浴宇、陈同生等陪同，从管文蔚、惠浴宇的回忆文章中均未见到有管有为陪同的记录，而且管有为此时已被派往镇江做情报工作，从时间上、身份上均没有陪同去泰州的合理性。

查《陈毅年谱》，1939年陈毅曾六次去江北，分别是春末、5月上旬、5月下旬、夏、8月和12月上旬，接近管有为受陈毅、管文蔚派遣到镇江的“1939年春”的前三次。

先看“春末”之行。“(陈毅)带(军部)巡视团渡运河，在挺进纵队司令员管文蔚陪同下渡江到扬中，次日抵吴家桥……”从惠浴宇文中可知，管有为给陈毅算命时，陈毅与张茜刚开始恋爱，陈毅是1939年3月初，在新四军军部的一次演出中第一次见到张茜的，春末张茜随军部巡视团来一支队视察、慰问，双方尚未进入恋爱状态，关系更不可能为外人所知，因此此行可排除。

再看“5月下旬”之行。陈毅接受宴请，给“挺纵”广大指战员讲话，对数千群众发表抗日演说……从此行全程来看，陈毅接触广泛，声威显赫，带有激昂士气、发动群众、扩大新四军影响力的意图，与惠文中陈毅行止高度保密的状态明显不同，此行亦可排除。

最后看“5月上旬”之行，“……(陈毅)旋在管文蔚陪同下从扬中过江到江北吴家桥，听取苏北工委书记惠浴宇关于苏北工作的进展和二李部队情况的汇报后，指示惠要深入了解二李部队的政治动向。”可见陈毅此次去江北，是听取党内工作汇报以及对李明扬、李长江部的敌工工作汇报的，任务机密，理当行止保密。由上可以推断，陈毅与管有为的相识应在1939年5月上旬。

新发现的管有为手迹与诗作

近日，著名军史作家王见纲发表了一篇文章《1939年，受陈毅指派打入日军内部的“江湖术士”》，文中写道，王见纲在看望隐居广东深山的恩师王一大时，发现了一本署名“卧月山人谨识”的手卷，该手卷书法功底深厚，诗词意境不凡，如“赋得朴夫笑，士有千秋志”“几人能吐凤，此辈枉谈鸡”等佳句，颇见作者的高远志向。

王见纲向恩师求问，王一大老师解释说：“卧月山人原名管有为，是1923年前后师祖在江浙云游时收的一名相术弟子，也就是我的师兄。可惜后来因他学艺未精，师祖离开江浙时没有把他带走。直到10多年后，也就是在1939年秋，我奉师祖之命去江苏找他，



管有为烈士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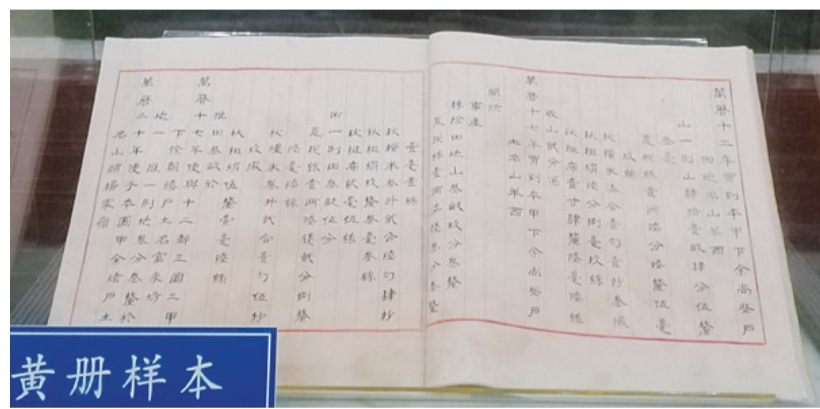
要他同回南粤，以避凶数。历经千辛万苦，我终于在镇江找到了管有为，但管有为已为驻军在镇江的日军做事，不愿意离开镇江。他给了我一些路费，并将此书给我作为留念。我与管师兄仅一面之缘，在多年之后才听说他被日本人杀死。”

据王见纲向笔者介绍，王一大老师的师脉相承于战国时期著名的道教奇人鬼谷子，独门秘术，十分精准。关于管有为师父推算出的“凶数”一事，《惠浴宇回忆录》也有相同记载。在管有为初见陈毅为其“算命”后几天，“陈毅把管文蔚找去问，你家那个‘半仙’走没走，管文蔚连忙解释道：那个家伙只是个走江湖混饭吃的，老总不要理他。陈毅笑着说，怎么能不理呢，他可是个有大用处的人啊。我们唯物主义者，当然不信算命那一套，但镇江城里的鬼子队长，却是个唯心主义者，迷信得很，求神问卦，很是虔诚。你派管有为去镇江，一定能得到鬼子的信任，我们就可以在鬼子的心脏里，建立一个战略情报站。他这个‘有为’就真的可以在抗战中大有作为。老管找族孙谈，管有为一开始还不肯答应。他说：我自己给自己算过命，鼻子长得不好，这两年有血光之灾，必须易地避祸，所以我从江南跑到江北来了。你这不是叫我回江南送死吗？管文蔚苦口婆心做了许多工作，他才开口答应：是祸躲不过，与其窝窝囊囊死，不如做一个抗日义士牺牲。”

从文中可见，管有为对回镇江开展情报工作的任务一开始是拒绝的，最终从民族大义出发，才毅然接受。这一段记述读来，不仅不能丝毫稍减烈士的伟大，反而使烈士的形象更加真实。烈士本是普通人，谁生来向往牺牲，但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时，明知必死而往之，这份升华正是烈士的崇高与悲壮之处！

明朝人口普查的见证——黄册

□ 郑学富



黄册样本

南京玄武湖黄册库遗址展室内展出的“黄册样本”，是明代人口普查的数据汇总。据悉，明朝初年搞的“人口普查”比美国(1790年)和英国(1801年)的“国情普查”早400多年。英国学者卡尔津曾撰文说：“此为全世界最早推行全国人口普查的明证和榜样！”

大明王朝甫立，由于长年军阀混战，版籍俱损，流民覆野，百废待兴。如何构建完整的社会治理秩序，是朱元璋面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此时，南直隶宁国知府陈灌推行了户帖制，朱元璋认为此法甚好，于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下令在全国推广。户帖制度，其实是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过程。户帖的格式和调查项目由户部统一规定、统一印制，登记的项目

有：户的种类、户主原籍、居住所在地、家里人数、年龄、性别、与户主的关系等。户帖有帖、籍两联，籍联统一交给户部存档，户帖交给各户收执。

户帖制的推行，有效抑制了豪强的土地兼并，农民得到一部分土地。朱元璋减免赋税，奖励垦荒，组织各地农民兴修水利，大力提倡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和果木作物。到洪武十四年(1381)，洪武之治已经显现，百姓安居乐业，朱元璋在户帖的基础上开始推行黄册制度。

黄册制度相比于户帖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朝廷把居住在城乡的每个住户按照籍贯、姓名、人口、田宅、地亩等逐一登记造册。每十年编造一次，每册一式四份，分别上报朝廷户部及省、府、县。因上报户部的册子封面是黄纸，故称为“黄册”。黄册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举其中丁口、田粮最多的十户为长，轮流担任里长，其余的一百户分成十甲，每甲十户，此十户户长在十年中轮流担任甲首。里长与甲首分别执行这一年中该里、该甲的差役，他们轮流的次序，都是根据丁粮多寡排定先后。黄册以户为单位，登记户籍户等、人丁事产两大部分的事项。其中人丁部分包含计家男妇、男子、成丁、

不成丁、妇女、妇女大、妇女小等项，含每人的姓名、年龄；事产部分包含田地山塘(总计)、田、地、山、塘、房屋、车船、头匹(耕畜)等项。

明代早期的黄册把人口分为三等：民籍、军籍、匠籍。民籍包括儒士、医生、阴阳卜士等。军籍有校尉、力士、弓手、铺兵等。匠籍包括厨役、裁缝、马船工匠等。另外，濒海地区盐户叫盐灶籍，佛教寺院有僧籍，道教观曰道士籍。明中后期，又增添官籍、商籍、先贤籍等。民户增有天地坛户、种树户、坟户、光禄寺户、陵户、庙户、园户、瓜户、果户、米户、藕户、窗户、羊户、乐户等。凡各色人等均按从业类别登记户籍。人户以同性著籍，禁止异姓合户。若有遗漏、脱户等，允许民户自行核实补报。

朝廷视黄册为国家典籍，颇为重视。皇帝郊祀时，中书省吏员专门将黄册陈列于坛下，以示荐予上天，皇帝率百官行祭天大礼。礼毕，黄册贮藏于南京太平门外后湖(玄武湖)东西二库。

黄册制度既是明代的赋役之法，也是明代的户籍制度。成为明代社会经济方面重要的基本制度。黄册制度在明代广泛实行，并伴随明王朝的兴衰史。从洪武十四年至崇祯十五年(1642)，共攒造了27次。据《后湖志》载，每次大造各地送南京户部后湖收贮的黄册多达6万余本，至明末，所贮历代黄册在200万本以上。然而，由于改朝换代和战乱频发等原因，遗存的明代黄册文书，多是在乡里保存的黄册底籍、草册及抄底等。

